

七日談

(廣東篇)

澳門與「雙典一報」：中西文化對話的破冰之旅

梅 毅

四百多年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讓澳門這個位於中國南海之濱的小城成為了中國與世界對話的重要窗口，也是西方了解中國的起點。

十六世紀中葉，當葡萄牙人踏上這片土地時，一場持續數百年的文化對話便拉開了序幕。這片僅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長期向西方開放的平台。在這裏，不僅貿易的船隻往來頻繁，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語言和知識的交流也在此生根發芽。從十六世紀的傳教士到十九世紀的「雙典一報」，澳門見證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文化交流工具的誕生，它們不僅幫助東西方人們互相理解語言，更讓兩種文化得以深度對話。

澳門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密不可分。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十六至十七世紀，澳門成為東西方國際貿易的重要中轉港——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通過澳門運往世界各地，西方的白銀、香料和工藝品也經澳門進入中國。

隨着貿易的繁榮，文化交流也隨之展開。在東西方交流初期，語言障礙是最大的挑戰。早期抵達澳門的傳教士和商人不得不依靠簡單的翻譯詞表和當地通事（翻譯人員）進行溝通。這種狀況嚴重限制了交流的深度和準確性。一九五四年，耶穌會士在澳門創辦了聖保祿學院，這是遠東第一所歐式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最早的漢語培訓基地和最早的傳教士漢學家的搖籃。它的創建源於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的遠見——他從實踐中深刻感悟到，要進入人口眾多、幅員廣大的中國，必須先懂得漢語。

聖保祿學院是一所規範有序的學府，其教學、考試、學位制均採用歐式高校模式，擁有藏書四千多冊的圖書館和一個印刷所。學院的特色是以神學與漢語學習為主課，嚴格規定每個教師和學生都必須學習漢語。它是清廷許可

的唯一通向中國內地的中轉站，規定凡是準備入華的傳教士，必須先「赴廣東澳門天主堂住二年餘……學習中國語言」。這使得澳門成為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前必經的關卡。據記載，從一五九四年成立到一八〇七年關閉的二百一十四年間，聖保祿學院培養了一百零九名到中國內地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其中包括利瑪竇、湯若望、金尼閣、龐迪我、熊三拔等一大批著名學者。他們不僅深入學習了漢語，還深入研究了中國的文化和經典，成為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西方漢學家 and 精通漢語的專業人才。他們在中國內地宣傳教義的同時，也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當歷史進入十九世紀，一位英國傳教士的到來，進一步深化了中西語言交流的層次。英國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是在澳門從事漢語學習和字典編纂的重要人物。一八〇七年，二十五歲的馬禮遜受倫敦傳教會派遣前往中國。馬禮遜堅持學習中文，不到三年就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官話和粵語。也是在這段艱難求學期間，他深刻認識到，語言交流是文化理解的基礎，而沒有字典，語言交流就無從談起。一八



▲澳門大三巴牌坊是天主之母教堂（即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的遺址。

〇九年，馬禮遜因其中文能力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聘為中文譯員，這為他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也讓他有更多機會深入研究中文字典的編纂工作。一八一五年，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第一卷出版；到一八二三年，整部字典全部出版完成，這時已經是馬禮遜到廣州府的第十六個年頭。

《華英字典》是中國第一部英漢字典，一共六大本，四千五百九十五頁。但它不僅僅是一部字典，馬禮遜在這部字典中，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宗教及習俗等，作了全方位的介紹，使它成為一部關於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在解釋「一」字時，馬禮遜順便介紹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家思想。這部字典還是白話文之先導，創造了「鉛筆」「批評」「消化」「交換」「審判」「自然」「必要」「演習」「半徑」等大量漢語新詞，豐富了漢語表達能力。這部字典也是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重要讀本。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上提到，林則徐曾專門索要一本馬禮遜編的字典的完整本。

與此同時，另一位重要的文化橋樑人物也在澳門活躍着，他就是葡萄牙遣使會傳教士江沙維。這位被稱為「公神甫」的學者，在一八一四年到達澳門，原計劃前往北京，但因故滯留澳門，在聖若瑟修院從事教學工作。在澳門期間，他深深意識到中葡語言交流的障礙，於是投身於漢語研究和詞典編纂工作。一八二九年，江沙維在澳門出版了《漢字文法》，這是一部系統介紹漢語語法的著作。

在此基礎上，江沙維於一八三一年出版了《葡華字典》，一八三三年又出版了《華葡字典》。這兩部字典的誕生，標誌着中葡語言交流進入了系統化、規範化的新階段。此後，他還出版了《拉丁語大字典》和《拉漢大字典》等作品。他的一些著作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八年間被翻譯成法文，影響了歐洲的漢學研究。江沙維的著作有一個鮮明特點：漢語口語

和書面語兼顧，注重實用性。他的作品不僅幫助西方人學習漢語，也推動了中國語言研究的系統化。他的《拉漢大字典》在一九二二年還被重印，稱為《中華辣丁合璧字典》，可見其學術價值的持久性。

在中國近代報業史上，澳門同樣創造了第一。一八二二年，中國境內第一份近代外文報紙《蜜蜂華報》在澳門誕生。這份葡文周刊的出現，標誌着澳門在中西信息交流史上又一項開創性貢獻。這份報紙的誕生，與葡萄牙國內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當時，葡萄牙立憲派與保守派的權力鬥爭，延伸到了澳門這個海外殖民地。一八二二年八月，立憲派領袖巴波沙當選澳門議事會主席後，驅逐了保守派首領，並與同屬立憲派的葡萄牙醫生阿美達聯手創辦了《蜜蜂華報》。報紙取名「蜜蜂」，意在借用蜜蜂螫人的特性，來對轄區內的保守派進行鬥爭。

然而，《蜜蜂華報》的生存期並不長。一八二三年九月，葡萄牙保守派政變成功，新政權指責《蜜蜂華報》存在言論問題，但該報並沒有立即停刊，直到一八二四年一月，由保守派創辦的《澳門報》正式發行，《蜜蜂華報》才正式停刊。儘管《蜜蜂華報》僅出版了六十七期，只存活了一年零三個月，但它作為中國新聞史上一個里程碑似的亮點，其地位不可撼動。

從《蜜蜂華報》的創刊，到《葡華字典》、《華英字典》的編纂，這些在澳門誕生的語言文化里程碑，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對人類文明交流的啟示。它們告訴我們，理解和尊重是打破文化隔閡的關鍵，而語言則是實現這一理解的重要工具。澳門這座小城，以其四百多年的文化融合經驗，向世界展示了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的可能性。在當今世界面臨各種文化衝突和誤解的背景下，澳門的歷史經驗顯得尤為珍貴。它提醒我們，開放包容、互學互鑒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

烽煙筆墨：徐光耀和他的《平原烈火》（下）



人與事
慕津鋒

鐵漢》，雜誌社編輯們將其稱為工農兵創作的第一座「紀念碑」。

一九五〇年七月，徐光耀的小說《平原烈火》收入丁玲、田間、陳企霞、康濯、蕭殷擔任編委的「文藝建設叢書」第一輯，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平原烈火》一經發表便引起較大轟動，當年便再版三次、印刷一萬五千冊。一九五三年，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上作大會報告，談起建國後的文學創作時，特意提到兩部長篇小說，其中之一就是《平原烈火》。丁玲對這部作品評價也非常高，她認為這部作品與當時流行的蘇聯作家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相比，只差了那麼一點點。《平原烈火》被稱為社會主義文學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它的出現為後來的革命戰爭題材長篇小說的創作打下了

基礎。

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新中國第一家專業文學機構在北京正式成立。為打響出版第一炮，人民文學出版社審慎地選擇作品。很快，小說《平原烈火》走進他們的視野。他們認為這部作品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反映冀中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戰的長篇小說，它真實再現了燕趙兒女不畏強敵的中華民族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該小說既符合「為工農兵」的文學方向，也與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高度符合。就這樣，一九五一年五月《平原烈火》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部「開社之作」隆重推出。

對於自己的這部作品，徐光耀晚年曾有評價：《平原烈火》的最大優點是情感健康，那裏沒有消極的情緒的發洩，那裏頭是堅決鬥爭，處於失敗的情況底下，也堅持樂觀主義的奮鬥。

二〇二五年八月，徐光耀迎來了百歲華誕，今年也是他文學創作八十周年，《平原烈火》出版七十五周年。在此，我謹以此文向先生致敬，感謝他為新中國文學創作出《平原烈火》這部紅色經典小說。



藝象尼德蘭
王加

翻修閉館悻悻而歸之後，今年重返終於踏進了大師親手打造的花園，以及位於花園另一側包含全新故居博物館入口的「魯本斯體驗館」。

這棟畫家於一六一〇年購買的豪宅，既是大師居住多年直至去世的居所，也是他龐大工坊的所在地。當時他花了八千九百六十荷蘭盾（相當於今天的十五萬歐元），加上自己一幅畫買下了這棟豪宅。然而，相對低廉的購房價被他包括雕塑博物館、門廊、工坊、花園等複雜的重建計劃一筆勾銷。魯本斯將其親自設計並改造成了一幢意大利巴洛克式的宮殿，其日常開銷還包括兩名園丁、女傭、管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的薪水。在此居住超過二十年、後半生名利雙收且坐擁兩個皇室爵士頭銜的魯本斯，在此創作、學習、打理訂單生意、舉辦社交派對、並接待全歐慕名而來的重要客人；他令人咋舌的工作量和巨大的生活開支實際上是成正比的。

站在魯本斯故居的正門口，這棟古色古香的佛蘭德斯老宅大門緊閉。相比之下，被安特衛普市政府買下，並改造成全新魯本斯故居博物館的入口，其全玻璃外牆建築則極具現代感。新館一層包含售票處和文創商店，二層是公共圖書館，地下一層則是全新打造的「魯本斯體驗」（Rubens

難忘的「魯本斯體驗」

Experience）。料想故居翻修，新開放的空間大概是介紹藝術家生平和多媒體類展覽，因此行前並未抱太多期待，想着匆匆體驗下即可。出乎意料的是，我竟在此逗留了近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只因這個名為「魯本斯體驗」的沉浸式展覽實在給了我太多驚喜。

走下旋轉式的樓梯，兩側的印花窗簾環繞着一尊魯本斯的銅像，似乎大師正在迎接我們走進他的「人生大秀」。在「魯本斯體驗館」中，陳列着魯本斯極具辨識度的自畫像、曾坐過的椅子、當時使用的所有顏料原石，以及很小一部分大師私藏的藝術品，凸顯了大師鮮活的「存在感」。然而，「體驗」的核心在於互動，魯本斯故居博物館利用現代最新的高科技聲光電手段，讓觀者既能了解大師的心路歷程和經典畫作，還能通過互動參與其中。

在所有體驗環節中，除了常見的可放大作品局部的觸摸屏，還有可模仿畫中人物姿勢的模擬器、根據選擇物品價值了解十七世紀佛蘭德斯物價的排序欄等，最令我意外的是每半小時播放一次的藝術家生平視頻（整點弗拉芒語半點英語場）。遍布場內的大小大小數十個屏幕在其他時間各司其職，待到觀眾在弧形座椅排排坐、場內滅燈影片開始時，屏幕便以五花八門之姿不停地更換魯本斯的代表作、肖像畫及書信，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雖有解說，但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電影，而是一種通過四面八方的畫作，讓你在最短時間內直觀感受魯本斯藝術魅力的全新

視覺體驗。那種撲面而來的衝擊力甚至超越

了站在單一原作前的觸動。

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互動環節便是「親自入畫」。在體驗區最裏面的角落，有個類似於自助拍照機的觸摸屏，牆上的掛鉤放着巴洛克時期紳士和貴婦脖子上戴的拉夫領（Ruff Collar，又稱輪狀皺領），可自行佩戴並拍照留念。但其特殊之處在於，觀者自拍完的照片會被「嵌入」一張由魯本斯私藏、十七世紀畫家威廉·凡·哈切特所繪的《科內利斯·凡·德·吉斯特私人畫廊》。這位魯本斯友人家中滿牆的畫作中會「驚現」一張我的自拍，並可掃碼下載留念。擁有這樣一份能讓每個人充分參與且獨具創意的觀展紀念品，誰會忘記魯本斯故居帶來的這份特殊回憶呢？在僅包含二十餘件真跡、全靠聲光電等互動體驗撐起的魯本斯體驗館內，我看到了未來呈現經典藝術的嶄新趨勢——結合真跡展示的沉浸式體驗不能僅浮於表面的打卡拍照，而是要通過策劃者的巧思設計讓觀者通過互動，牢記大師生平和名作細節，最終令每個人充實且心滿意足地離開。



▲「魯本斯體驗館」展廳一隅。作者供圖

脫下高跟鞋



喧暖人生
香寧

剛入職場的那些年，學為人處事是第一課，學穿着高跟鞋出去開會竟也是必修課。從三厘米到五厘米到八厘米，後來我甚至練就了穿着高跟鞋一路小跑的本事。

時隔多年因為工作環境的轉換，我已無需再穿高跟鞋，便裝波鞋是常態，即便出席活動，大家也都身着類似的裝束，十分輕鬆。直到工作原因，我又回到了商務會議、活動的日常穿着。

那天去拜訪客戶，對方是一家跨國上市企業。我初入金融圈，第一位上司曾嚴肅地批評過我那破舊的小行李箱，以及普通平底鞋。認為以這樣的配套示人，拉低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對於職場新人而言，這樣的話肯定印象深刻且留痕深遠。以至於當我接到會議通知時，本能地在鞋櫃翻了起來，曾經的

昂貴高跟鞋們都被二手給了需要的人。僅存一雙黑色漆皮八厘米高跟鞋，我毫不猶豫踩了進去，捉着精緻小包出門了。

走到樓下路邊等車，我意識到大事不妙。我的左腳被鞋頭擠得很痛。或許是我體重增加，或許是皮鞋老化，又或者是我太久沒穿高跟鞋已經不適應穿高跟鞋的走路姿勢。我的腳在鞋裏變換着角度，毫無幫助。可是車已經到，我只好硬着頭皮上車。好在點對點交通，基本不需要走路。真正的麻煩是會議結束後，對方饒有興趣地要帶我們參觀他們即將搬入的新寫字樓，以及公司歷程展示廳。我忍住劇痛，一步步走過兩個街區，抵達新地點，又站立約半小時聽取介紹。有一瞬間我覺得腳被上了刑具，不斷罵自己為何要自尋煩惱。

等參觀結束我看了一眼時間，還要趕去參加一位朋友的歡送會，她要派駐外國，明日啟程。下班高峰期，叫不到車，十分鐘的步行距離，網約車的價格竟然飆升至接近二百元。另一位朋友已經電話來催促，我一頓訴苦高跟鞋這禍害，又在路口焦急地導航辨認方向。

等我咬牙走上漫長的天橋樓梯，走向中環廣場大門，看到了正來接我的朋友。我扶牆咧着嘴叫：「腳痛得不行了，我想光腳走路。」他看了看地面，「痛成這樣，把鞋脫了就是。這大理石地面也算乾淨，沒事。」我毫不猶豫除下高跟鞋，光腳走在寫字樓內平滑的大理石路面上，那一瞬間如釋重負。我笑着對朋友說：「我這樣太不雅觀了，你別走在我身邊，免得讓你尷尬。」可

朋友卻說：「這有什麼，大家肯定知道你是萬不得已被這高跟鞋折磨成這樣的。我陪你走，別想尷尬不尷尬的。回家好好洗腳就是。」

於是光腳一路走到會展中心內，抵達附近的酒店餐廳聚會地點。餐廳服務員在朋友的說明下，貼心地去向酒店要了一雙拖鞋給我，好讓我不用繼續光腳用餐。歡送朋友的聚會，三分之一的時間我們用來探討高跟鞋對女性在职場的重要性，結論是這早就不是必需品，更不是女性在职場的標配。畢竟對客戶的尊重，絕不是靠穿一雙高跟鞋赴會來體現。

朋友們的體貼和酒店餐廳的人性化關懷，緩解了雙腳的疼痛。而我，也終於放下高跟鞋代表尊重和職業女性的執念。